

做治国平天下的学问

——追记查瑞传教授

段成荣

【人物简介】 查瑞传 1925 年 6 月出生于天津,1942 年考入辅仁大学,1943 年转入西南联合大学,1946 年毕业;因成绩优异,被免试推荐入清华大学化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并担任助教。自 1950 年初始,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20 世纪 70 年代初从统计学专业转入人口学领域,从事人口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会第一至第四届委员、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咨询组成员、北京市第九届和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

他撰写的专著、教材和译著达 10 种以上,人口学学术论文 70 多篇。代表性著作和论文包括:《人口统计学》(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年)、《抽样调查基本知识》(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 年)、《人口通论》(译著,商务印书馆,1983 年)、《人口学辞典》(合编,人民出版社,1986 年)、《男女老少比例的学问》(辽宁出版社,1987 年)、《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技术》(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1991 年)、《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年)、《人口学百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 年)、《为什么计划生育不断普及,出生人数和出生率还会回升》(《人口研究》,1977 年第 2 期)、《略论人口再生产》(《人口研究》,1979 年第 2 期)、《人口预测的几个基本问题》(《人口研究》,1980 年第 2 期)、《加强对人口年龄结构的研究》(《统计研究》,1980 年第 2 集)、《静止人口与稳定人口》(《人口研究》,1981 年第 1 期)、《有关人口计划的几个问题》(《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集》,《人口研究》(增刊),1981 年)、《计划生育和保障人权》(《中国人口报》,1991 年 8 月 9 日)、《人口研究中的时期分析和队列分析方法》(载于翟振武主编:《人口数据分析方法及其应用》,外文出版社,1992)、《对五省一市妇女初婚年龄的分析》(《人口与经济》,1992 年第 1 期)、《北京市几代妇女婚姻生育的变化》(载于常崇煊主编:《海峡两岸中国人口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2 年)等等。

一、人口统计学的一代宗师

提起查教授,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人口统计学家,因为他在人口统计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是如此突出。

他首创了科学、完整的人口再生产指标体系。中国人口学恢复之初,亟需一套度量人口再生产的指标以指导中国的计划生育统计和人口研究工作。当时,在中国几乎找不到有关的参考资料,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查教授依据人口现象的内在规律,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套科学、完整的人口再生产指标体系,并用科学、严谨的语言将这一指标体系归纳到《人口统计学》一书中。这一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粗人口再生产率、净人口再生产率、平均世代间隔、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等指标。时至今日,这一指标体系在中国计划生育统计和人口学研究中仍然是最基本的工具之一。

他规范和统一了人口统计学的基本概念。人口统计学是人口研究和计划生育统计工作的基础。搞好人口统计学的规范化建设,是整个人口研究工作的基础环节。查教授充分认识到建立规范化概

念体系对于学科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科都曾经大规模地组织本学科的著名专家对概念体系进行规范。在中国人口统计学的发展过程中,查教授长期执着地对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进行探讨、界定,为在中国建设规范的人口统计学做出了大量奠基性工作。今天大家所熟悉的很多指标,如总和生育率、性别比、生命表、平均预期寿命、粗死亡率等,都是经过查教授努力之后才得以定名并被接受为人口统计的标准名词的。以“平均预期寿命”一词为例,该词来源于英文词汇,长期被人们误译为“平均期望寿命”,查教授仔细推敲后将其更正为“平均预期寿命”。Expectation of life 一词,在汉译上长期被人译为“平均期望寿命”,并在许多专业学术著作中流传、使用。查瑞传教授明确指出:Expectation of life 一词,其本意是指一定死亡水平上预期每人平均可活年数,而非主观上“期望”活多少年。将其误译为“平均期望寿命”是不确切的。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采纳了他的这一见解,并在后来发布的关于规范人口统计指标、术语的通知中给予了肯定,并发布全国遵循使用(吴忠观,2000:135)。又比如英文 total fertility rate 一词,原来被翻译“总生育率”等多种叫法,使用极其混乱。根据该指标能够综合全面地反映妇女的整体生育水平,同时又是各分年龄生育率之和的特点,查教授将其定名为“总和生育率”。顾宝昌博士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能够将 total fertility rate 如此传神、准确地翻译为“总和生育率”者,非查教授莫属。

他刻苦研究,对中国人口现象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一片空白,百业待兴,许多事情都需要从零开始。人口预测就是其中之一。在进行出生人数和总人口预测工作中,当时有些学者套用国外按实际年龄及生育率进行推算的办法,这不适合中国当时生育水平逐年下降的国情;有些实际部门则按当时每个妇女婚育状态加总计算今后5年期间出生人数,这也与实际不相符合。查教授与其他同志合作,按现有生育政策要求与实际分年龄分布情况推算出“标准生育率”,从而提出“标准生育率”预测法,为在有计划控制人口条件下进行人口预测开辟了一条新途径。1977年,查教授首次提出,当政府一旦严格提高规定的结婚、生育年龄、限制并大大压低生育子女数时,生育水平必然会出现短期内的“急刹车”效应。最初几年生育率陡然下降,而随后又会逐渐回升到高于最初几年但低于原先的水平(人口计划统计组,1977)。这篇文章不仅说明了当时使大家困惑不解的生育率“开始急剧下降、继而停滞、甚至回升”的现象,而且预见到,计划生育开展越早、控制越严、工作越好、成绩越显著的地区,这种回升现象出现得将会越早。后来在上海、北京等计划生育先进地区果然观察到了这种现象,他的观点得到了印证。查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使一些地区避免了草率调整政策执行力度的做法。80年代初期,查教授又指出,由于50、60年代生育水平高、出生人数多,以致80年代青年人比重高,虽然生育水平已大大下降,每年所生子女仍远远超过死亡人数,人口仍会继续不断增长。这是在国内首次提出和运用“人口惯性”原理,向实际部门和人口理论界澄清了人口发展的这一重要内在机制,防止了人们往往只根据增长率高低判断人口发展态势的片面性。

20世纪80年代初,查教授就开始讲授“数理人口学”课程。他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学生们都希望他能将其“数理人口学”讲义付梓成书。查教授自己也多次表示要在有生之年编写一本高质量的《数理人口学》教科书。然而,他多年形成的不达完美决不罢休的习惯使他迟迟不肯将已经形成的讲稿付印,而他乐于助人、不轻易拒绝别人特别是不拒绝学生的风格又使他大量时间花费在帮助他人而没有时间完善自己的书稿。就这样,他未能在有生之年出版《数理人口学》一书,给自己留下了遗憾,也给中国人口学界留下了遗憾。

二、做治国平天下的学问

也许是因为查教授在人口统计学领域所做的贡献过于突出,以致于他在人口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反而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其实,查教授在人口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与他在人口统

计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同样重要。

查教授认为,自古及今,研究人口问题始终是治国、平天下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把人口研究放在了治国、平天下的战略性高度,查教授一直十分关注对重大人口理论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不仅如此,查教授在进行人口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他(1998)认为,科研工作者的根本职责在于研究问题、明辨是非、揭示真理、传播真理、坚持真理、造福人群”。为了真理,他敢于向传统理论和流行观点挑战,为中国的人口理论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查教授认为,在诸多人口问题中,人口数量问题不仅现在是而且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仍将是中国的首要人口问题。他对人口理论问题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人口数量控制问题展开的。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普遍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由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所决定的。查教授认为,这种将计划生育与计划经济生硬地联系在一起是不对的,尽管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理论上简单易行的便利和政治上的强大说服力,但将二者简单联系在一起,既不能很好地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提供理论武器,还可能在理论上埋下隐患。

为此,查教授于1981年初撰写了《有关人口计划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为什么人口数量必须控制”这一问题,他认为,“按照人类的生育能力,一对夫妇若不从主观上控制,生四五个甚至更多的孩子是轻而易举的。这样的生育能力,放在远古时代大致能弥补人类的死亡,使种的繁衍得以继续,而放在今天,则会导致人数增加太快,耗费掉增产的财富,不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反过来妨碍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他还指出,尽管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互有影响,但除了衣食等生活必需品少到不足维持生命的极端情况外,人口和经济是各有独立发展规律和途径的。他认为这正是我们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必须推行计划生育、有目标地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依据。目前,查教授的这些观点或许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在当时,这些观点还只能是理论上的少数派。而查教授所担心的理论上的隐患也很快变成了现实的问题。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长期以来为人们所熟悉的计划经济体制很快退出中国经济生活的舞台。计划经济没有了,计划生育怎么办?于是,在理论界和实际部门,迅速产生了一种疑问: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还要不要搞计划生育?到这个时候,我们才体会到了查教授作为理论家的洞察能力和预见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然还要坚持计划生育。为了澄清理论和思想上的混乱,查教授(1993)系统地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生育事业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人们之所以产生还要不要继续搞计划生育的疑问,是因为70年代后期以来,有些人口理论学者曾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要求人口也要有计划地增长。既然这种论点长期以来被作为中国必须实行计划生育的理论依据,那么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新目标的今天,人们自然会产生还要不要继续实行计划生育的疑问。这个问题的产生有两个原因:(1)把社会主义制度与计划经济不恰当地从本质上联系起来;(2)望文生义,把中国推行的计划生育与计划经济硬扯在一起。

论文从上述两个方面对人们的疑问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解答,然后明确地提出:“正因为计划生育不是由于实行计划经济而产生的,二者没有必然联系,所以计划生育绝不能由于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放松,更不能取消”。“随着经济水平的初步提高,经济管理的初步转轨,计划生育某些行政管理职能的调整,生育水平在一定时期内反而有可能有所反弹。所以在近期内计划生育工作预期将会面临更艰巨的任务。计划生育工作应该有所加强”。查教授的论述,对于尽早消除当时在思想和理论上的困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并规定人们普遍必须遵行的结婚生育行为规范以来,国外有些人不断攻击我们这样做是破坏了生育自由,侵犯了人权。长期以来,我们只是用“国家

指导和个人自愿相结合”来加以解释,并未能说明政策硬性规定生育子女数上限的合理性,因而在对外宣传上难以做到理直气壮。

经过深入研究,查教授于1991年撰写了《计划生育和保障人权》一文,系统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一对夫妇的生育行为至少涉及三个方面:生育者,被生育者,社会的其他成员和整个社会。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会议和1984年墨西哥城世界人口会议都确认了“个人选择子女数目和生育间隔的自由”。无疑,作为生育者的夫妇在生育问题上享有决定权。但是,生育问题上的决定权是否为他们专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被生育者、社会的其他成员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应该由谁来代表?查教授指出:“一对夫妇多生一个子女就给社会多增添一个成员。他(或她)将和其他社会成员共同生活在社会中,共享有限的空间和自然资源,共同劳动生产、共同消费社会产品、共享社会财富。他(或她)将与社会其他成员息息相关,怎能说生育是夫妇的私事,与别人无关?谁能够反映和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和需求?谁能够判断每对夫妇生几个子女对全社会最有利?不是任意一对要生孩子的夫妇,而是作为全社会代表的政府。因此,在考虑和尊重夫妇生育选择权利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和尊重社会其他成员和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意愿。这种考虑对每个社会成员是平等的”。所以,由政府根据全面考虑来制定公民必须普遍遵循的结婚生育的准则不仅不是侵犯人权,反而正是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人权。

这篇文章第一次正面论述了中国推行计划生育和规定行为规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不仅是论证控制人口的必要性),第一次论证了推行计划生育可以带有强制性(并非强迫命令),正面向“夫妇有权决定生育子女数”这一长期被国际上普遍接受的原则提出挑战。这篇文章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被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中国人口学会授予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在20世纪的100年里,中国人口和人口学的发展是丰富多彩的,但主题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关于中国人口是否已经过多、需要设法控制的争论,遂成为中国进入20世纪后学术界和政治家们数十年讨论和争论不休的中心话题”。今天,“中国人口必须控制”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国策。但是,“早在本世纪初,当中国人口估计只有4~4.5亿人时,已经有人担心并提出‘人满为患’的见解和忧虑。但也有人认为百姓所受的灾难痛苦完全是由于国内的政治腐败、封建剥削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而与人口众多无关。……随着西方学术思想和政治学说的逐渐传入中国,这个问题和争论越来越带上了政治色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凡是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增长太快,主张采取措施、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都被指责为信奉和传播马尔萨斯主义。反之,凡持进步或革命思想的,则讳言中国人口太多、增长太快”^①。

围绕这一中心话题的争论,中国在20世纪里至少公开进行了60年,又在思想上隐蔽地进行了10多年。由此导致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人口过度生育、人数大幅度增加,并给60年代后期的人口出生高峰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可能出现的另一次小出生高峰埋下了根源。可见,中国在控制人口方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因此,查教授认为,“中国人口必须控制”的结论来之不易,我们必须珍惜。在新的形势下,对“中国人口必须控制”这一结论产生怀疑甚至从根本上予以否定的观点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对此必须加以警惕。

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由于坚持不懈地推行计划生育,中国的人口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这种成就还是阶段性的,人口控制工作尚需进一步努力。但是,就在世纪转折之际,出现了一些不利于继续抓好人口控制工作的观点,比如,担心进一步控制人口会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过度老化;担心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会带来劳动力供给不足。出于这种担心,出现了要求“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主张。另外,多年来,我们在宣传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时,始终把“人口多、底子薄”作为重要

① 查瑞传主编:《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

的依据。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底子”将会越来越厚,这样,计划生育是不是就不必要了呢?

查教授认为,要从战略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的人口控制问题:“我们今后不断努力发展经济的情况下,终会摆脱过去和目前所处的这种‘底子薄’的状态。那时还需不需要控制人口呢?这个问题虽然不是迫在眉睫需要立即回答的问题,但确实是一个回避不了、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40年前,还有不少的人,特别是自命为‘左派’的学者,曾经以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存在人口问题、不可能出现人口过剩等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人口规律为依据,无视中国实际状况,振振有词地反对和批判在中国必须控制人口的主张。接下来只是在中国今天经济尚不够发达,所以必须控制人口的理由下,有条件地接受了当前中国人口必须控制的政策。这里就潜伏着一个问题,即当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了(这是我们一贯努力追求的目标),人口是否还需要控制?换言之,‘中国人口必须控制’究竟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措施,还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为了我们今后不再重蹈过去理论上和实践上所犯错误的覆辙,这个问题必须进一步澄清。”^①

他指出,简单地从“人口多、底子薄”的角度去论证人口控制的必要性,是危险的。“在论证中国一定要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的必要性时,很多人(包括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往往把中国经济还不够发达作为根本理由。从实际情况看,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是,如果深入一层思考,这种论证就隐藏着一个理论上的漏洞和危险。既然必须控制人口是由于以往和现在中国经济不够发展,那么,这是否等于说,假如过去中国经济已经十分发展或工作中没出现什么失误,或者今后中国经济大大向前发展了,中国就没有控制人口的必要了呢?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含糊不得的问题。如何认识这个问题,思想上必须明确,理论上必须澄清。上述那种看法虽然也承认在中国必须控制人口,但只是对经济还不够发展的一种应付的对策,是从策略角度提出来的。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控制人口的意义,没有把控制人口当作一种长远战略来对待。这样的态度不但从理论上看是片面的、低层次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短视的、危险的、隐藏着无穷后患的。”^②

三、关于人口学的未来发展

查教授十分关心人口学的未来发展。在去世前一天,他还对家人讲:作为唯物主义者,我并不怕死。但是,我不想死,因为在我的脑子里还有很多思想没有写出来,还有很多人口问题等待我去研究。他特别关心人口学发展的未来走向。

(一) 人口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

查教授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控制人口的问题上走了一条曲折的弯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没有真正坚持我们多年来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相反,却采取了教条主义的做法。总结20世纪中国人口学和人口理论发展的历程,其中最为宝贵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我们的事业就能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违背实事求是的路线,我们的事业就必然面临挫折和失败。因此,在未来的人口学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时时提防、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基本的保证条件就是要重视和加强调查研究。查教授(1999)指出,我们强调在研究人口问题时必须实事求是。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必须从实际存在的情况、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二是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所观察到的事物的表面,草率地得出结论,而必须通过周密细致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深入剖析各种不同因素与所研究现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以求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对策。

(二)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是人口学研究的方向

^{①②} 查瑞传:《人口控制:一个需要不断深入认识的战略性问题》,《前线》,2000年第7期。

查教授认为,未来人口学研究的基本方向是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他指出:“自从人类社会在地球上一出现,发展就从来没有停止。只不过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那样的缓慢,以致于给人们的感觉仿佛与停滞不前没有很大区别。然而发展一旦开始,就要沿着自己的轨道不断前进下去。每前进一步,都成为下一步更快发展的基础。千百万年人类社会就这样虽然缓慢、但却不停地、而且以加速度的方式发展着。直到经历了从欧洲发动起来的产业革命,社会发展踏上了前所未有的快速轨道。20世纪,特别是后半叶,人类进入了历史上的飞跃时代。像是失去了或部分失去了方向盘的赛车,人类在快速飞驰的‘发展号’列车上模模糊糊感觉到令人欢欣鼓舞、引以自豪、越来越快、飞速奔驰的‘发展’似乎有些失控。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伴生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地步。于是一些高瞻远瞩的有识之士率先登高疾呼,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口号。尽管这个口号现在已经被滥用,然而它仍不失为当今人类社会前进的指针……‘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切经济活动,一切关于环境保护的思考和措施,一切关于资源开发利用的涉及、安排和关于资源浪费、枯竭的担心,都是以人为中心来考虑的。离开了‘人’,离开了‘为全人类生活得更好’这一根本目标,上述一切考虑、一切活动都没有意义。人口学研究,包括中国百余年来所进行的争论和探索,离开了为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而且是可持续的物质和精神的福利这个目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说,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是今后中国人口学研究始终不渝的总方向。”^①

(三) 新问题层出不穷,人口研究将永无止境

查教授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口问题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人口科研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去研究和解决一个又一个的新问题。当前,“职工下岗待业现象出现,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流动,农村以前被束缚在狭窄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纷纷汹涌澎湃地外流。既给国民经济大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各地区的管理和建设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再加上因人口过多所引发的环境污染、破坏和保护的问题,资源掠夺式开发滥用和合理开发利用等问题,千头万绪。值得认真研究的人口问题旧的尚未能妥善解决,新的又不断连续出现。复杂的、连环的、与社会经济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的人口问题,正源源不断向我们挑战。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发展一天,人口问题便会相应地日新月异地出现。回顾既往,展望未来,我们必须有此认识,做好精神准备。”^②

在年轻人口学者中,有时候会产生“当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以后,还会需要人口学者吗”的疑惑。在这里,查教授给我们指出了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人口计划统计组:《为什么计划生育不断普及,出生人数和出生率还会回升》,《人口研究》,1977年第2期。
2. 查瑞传:《加强对人口年龄结构的研究》,《统计研究》,1980年第2集。
3. 刘铮、郭沧萍、查瑞传:《人口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
4. 查瑞传:《计划生育和保障人权》,《中国人口报》,1991年8月9日。
5. 查瑞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计划生育》,《人口研究》,1993年第2期。
6. 查瑞传:《努力争取做一个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人口研究》,1998年第1期。
10. 吴忠观主编:《当代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朱 犁)

①② 查瑞传主编:《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